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5.019

论古代辞赋的空间书写与文化成因

易永姣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辞赋骈文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辞赋在写作缘起和呈现形式、审美特性上都与空间相关。承续中国古人以己感物的思维特征和具体物象的空间表述方式,辞赋中的空间书写表现出强烈的意念化特征,追求美政、颂美皇权、离世独居、览胜抒怀、边域期许等不同的空间书写形式,是作家在不同人生际遇下情感历程的生动呈现,也是中国古代文士人生价值和道义精神的体现。

关键词:辞赋;空间书写;文化;审美心理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5-0157-09

孙维城认为:“中国艺术从某一个角度讲就是时间的艺术,诗文常以情感化的时间或以时间中的情感为描写对象,而这种时间的咏叹往往从空间开始,或以时间为对比、参照,尤其在登高望远之时。”^①虽然其强调的是时间艺术,但也客观地指出了空间的重要,特别是登高望远时,空间所产生的独特审美作用。《文心雕龙·诠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②指出了赋家登高望远,睹物兴情的发生机制。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认为诗主抒情,华丽细腻;赋绘物写景,爽朗通畅。登高望远产生宏大开阔的视野,绘物写景呈现爽朗通畅的空间感,这些都是大赋呈现大而美气象的重要因素。《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论赋之创作:“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③形象道出了赋之讲究文采、华丽美艳,在审美创作中具有“经”“纬”编织、“苞括宇宙”的空间性特征。由此可见,赋在写作和呈现形式、审美特性上与空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兼叙列二法:列者,

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④所谓“叙”,是依照时间叙事,乃纵向的铺陈;“列”,即横向的铺陈,带来的则是空间存在感。从创作题材上看,建筑、行旅、边域类赋作的横向铺陈带来的空间存在感和空间性特征最为鲜明。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这几类辞赋的空间书写结构及其与作家审美心理的关联。

一 辞赋的空间书写

中国古人对空间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传说,如《庄子》中混沌初开的寓言故事里,“南海”“北海”“中央”业已表现出古人对空间方位的抽象感知,而天地浑沌一体、凿七窍的情节,则类似于《三五历纪》所描绘的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天地混沌如鸡子……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这些都是古人在蒙昧未知状况下对天地宇宙的想象,并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⑤。因此,神话中古人对于空间的最初感知是

收稿日期:2021-05-08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9A301)

作者简介:易永姣(1974—),女,湖南沅江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孙维城:《宋韵——宋词人文精神与审美形态探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②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③成林,程章灿:《西京杂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④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具有一定现实基础的真实描绘,虽然这种描绘是想象的,带有一定夸张、虚幻色彩,但真实地体现出古人探索自然、引控自然的强烈愿望。由人有七窍而推想宇宙的思维模式,以及“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的这种具体物象的空间表述方式,表现出中国古人以己感物的思维特征,他们通过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生命形态来理解外在的世界,并赋予天地万物类似于人的生命和情感,其强烈的意念引控、独特的心理呈现与生动活泼的表现方式,在辞赋的空间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大体来说,辞赋中的空间书写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

(一) 时俗迫阨,轻举远游

楚辞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它所表现的理想世界与现实处境是文学中常见的一对难以调解的矛盾。现实世界的悲苦失意,会激发和强化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描摹,而理想世界的美好与难求,则越发加剧、衬托出现实的黑暗。在楚辞中,主人公因为现实世界的迫阨压抑而轻举远游、执着于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因而形成人世与仙界两重空间,在叙写上呈现出纪实性和虚构性交融的特点。其艰难的心路历程,通过行程记叙和行旅中的事物与观感来展示,呈现出明确的空间性。如《离骚》之上下求索,两次神游的经历,作者都采用了纪实的笔法:“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以陈词……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驰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轡乎扶桑。……吾令帝阨开关兮,倚阨闾而望予。”^①活动主体用第一人称“吾”;兰皋、椒丘、沅湘、苍梧、县圃、咸池、扶桑,直至天门,一系列的地名神界,呈现出清晰的神游路线,也生成了赋中一系列变化的空间场景;“步”“驰”“止息”“反顾”“往观”“上征”等表现主体行为的词语具有的行程指向,也体现出鲜明的空间性。这些正是后世行旅赋记叙行程时常用的空间结构方式。从《离骚》看,虽然这种纪实性叙写给人以真实存在感,但在具体场景的展示上却多虚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如写飞升场景,主人公芰荷为衣,芙蓉为裳,又有望舒为先驱,飞廉奔属,鸾皇神鸟戒严开道,雷神为之整理行装,

众多神圣,极富仪式感的职责分工,主人公命令日月、呼唤风雷的执着强悍,帝阨的冷酷拒绝,真实地体现出理想世界的神圣、高远与遥不可及的空幻性特征。在升天入地的“求女”经历中,除了行程记录,作者还注入了对场景细节和心理观感的描绘,极大地增添了作者现实处境的荒凉、悲苦,也增强了空间的真实可感:“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以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距离的遥远,环境的险恶,主人公的悲叹,一次次地多方求索搜寻,真实可感地呈现出理想世界的遥不可及。“求女”经历的最终失败则昭示着诗人赖以实行美政的理想世界最终破灭。而现实中的楚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君王失信、奸佞作恶,并非栖身之所。伏清白以死直的结局昭示着其对理想世界的执着和对黑暗现实的最后抵制。屈原开创了对黑暗现实世界的远离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两种空间对举的模式,在轻举远游的结构中,作者注入强烈的情感,其悲荒叹远的空间展示,流露的是作者现实处境的凄惨;神界的高远、被拒则是仕“不遇”的写照。

轻举远游是辞赋的常见空间结构模式之一,但在空间的具体表现方式上却有所不同。一是虚构、对比的空间呈现^②。如《招魂》用东、西、南、北、天、地六方的铺陈方式,用神幻奇特的想象,写各方怪异险恶之象,虽不离现实但极为夸张,如写西方沙漠无边,五谷不生,无水可饮,还有赤蚁、玄蜂等毒虫;北方飞雪千里等;写楚地同样采用铺排手法,浓墨重彩,极写宫室之辉煌,园圃之富丽,歌伎舞女之盛艳,饮食服御之奢侈等,穷形尽相,美不胜收。故都宫室之美与他乡四方之恶,形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二是注重景观和心理,彰显现实空间。如《九辩》明显地减少了虚构的、理想世界的成分,而突出了对现实处境的叙写,并把《离骚》中的现实失意与自然世界的悲秋氛围融合起来。后世赋中的“不遇”主题也基本沿袭发展着这一模式,其悲叹的意蕴更为深沉浓厚。三是较为独特的一类,如张衡的《思立赋》,仿照《离骚》模式,在知己难遇、众民邪辟的现实下,忧谗

^①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辞赋作品同。

^②孙旭辉:《宴游赋与我国传统物审美经验的形成》,《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惧祸,于是访仙山、登蓬莱、留瀛洲,欲游六合之外而又不能,最终从天上回落人间。虽然整体上依然是受黑暗现实压抑愤而远游的模式,但赋之末尾,眷恋故土而回到现实的主人翁,在进不能、离又不忍的无奈处境下,受自身意念的引控,找到了出路:洁身自好,退修初服,独善其身,驾六艺,编五经,驱儒墨之学,于理想与现实的世界之外,自创一个超然独处的自我世界。

(二)包举万物,控引天地

汉大赋的巨丽之美是体现国家、民族生命力的最好美学方式之一。多以皇家林苑、宫殿、都市等为对象,并且按地理方位,对物产植被、游猎规模、宫殿楼阁、制度文明等作大量铺排,形成巨丽华美的场面和宏大张扬的气势;通过主客论辩、天子悔过、说理陈志等方式,彰显君国权势和一统天下的政治意图;在场景的展现、变化中寓意时世推移、政治向度,呈现出包举万物,控引天地的艺术特色,但在空间表现上又有细微区别。

一是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的游猎赋,以夸耀、虚幻的空间描绘为特征。《子虚赋》中,齐王调遣境内众多兵车和上万名骑手,陪同楚国使者到东海之滨打猎,其庞大的规模、显赫的声势,昭示其显耀国土广大的用心。而子虚极力强调自己在楚国地位之谦卑、见识之浅陋,强调云梦不过是楚国七泽中最小的一个,再具体描绘云梦山势盘旋高耸,遮日蔽月;群山错落重叠,直上青云;山坡倾斜连绵,连属江河,用全方位的视角表现其贯穿天地、纵横东西的阔大宏深,可知云梦极小的排名定位乃意在突显楚之广大。在具体空间的书写上,则采用密集的意象群,以方位为序,罗列事物、安排事类,彰显云梦泽物产之丰厚奇特,并用众多的形似字、意近字,排列堆砌,产生新奇惊叹和目不暇接之感。如写其果园树美:“扬翠叶,扞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以夸张的笔墨,简短、排比的句式展现其张扬活泼、艳丽缤纷的色彩;体物状景则充分调动想象,摹声绘形,“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声貌岌岌其将动”。在整体结构上,则以主客形式设为问答,从南北东西各方位大肆铺陈,对区域内景观作“繁类以成”的物品罗列,虚幻夸张地展现天子游猎、宴饮等富丽、神圣的场景,形成铺张扬厉,雄奇壮美的艺术风格。

二是宫殿赋,以宫殿为主体对象,在空间叙写上多静态描绘,笔墨更集中。如王延寿的《鲁灵

光殿赋》改变了游猎赋、京都赋中多罗列宫殿建筑物名称、位置的虚空写法,而以灵光殿作为独立的审美主体,作者亲历其间,采用游览观瞻的视角注重对其栋宇结构、室内装饰作真实描摹,如“虬龙腾骧以蜿蟺,颌若动而躩踞。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虺缪虬而绕榱。白鹿子蛺于樛栌,蟠螭宛转而承楣。狡兔踈伏于柎侧,猿狖攀椽而相追。”作者对屋顶精美繁复的雕刻,虬龙、朱鸟、白鹿、蟠螭等物象形态的刻画,生动形象、惟妙惟肖。宫殿赋多以颂美皇权为旨归,情感也更为昂扬豪迈。描写宫殿多以宏大的视角取景,衬以鲜明的色彩,并植入极具力度的动词和彰显胸襟的主观情态语,营造宏伟富丽、挺拔刚健的美感。如王諝《明堂赋》写明堂“屹乎氤氲,孤标紫氛。璇题皓饰,金铺洞文。拱星辰以端居,傍眺白日;冯轩槛以直视,俯见青云。”用“氤氲”“紫氛”“璇”“金文”“白日”“青云”等极富色彩的名词,不仅形成苍茫辽阔的背景,而且产生强烈的光感效应;再以“屹”“标”“题”“铺”“拱”等动词,点染其宏大刚健的势态;在排沓起伏的短句铺陈中,又缀之以四六双句,再加以“傍眺白日”“冯轩直视”“俯见青云”等展示主观意志情思的语句自然融入,形成宏伟富丽的画面、灵动流转的气势和昂扬向上的气韵。李白《明堂赋》:“杳苍穹之绝垠,跨皇居之太半。远而望之,赫煌煌以辉辉,忽天旋而云昏;迫而察之,粲炳焕以照烂,倏山讹而晷换。蔑蓬壶之海楼,吞岱宗之日观。”更是极力彰显从不同视角仰瞻远眺,明堂奇妙玄幻的光色变化和映衬于天地山川的宏伟气势。华丽壮观的明堂在作家笔下,张扬的是大国盛世高远开阔、包容并蓄的宏大视野,也是盛唐时期唐人心目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精神的体现。

三是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为代表的京都赋,不仅写园苑、宫殿、田猎等,而且还描绘都市、郡邑等繁华热闹的场景,从整体结构上看,都市赋改变了宫殿、游猎赋开放宏阔及东西南北全方位铺排展示的格局,更多地聚焦于具体城市,并以其建筑、风物、生活场景为主,着眼于制度文明而涉及市井民生。相比于《子虚赋》《上林赋》完全出于想象、词句奇崛、大肆夸饰的叙写,京都赋更多地写京都的河山形势、表里布局和雄伟气象,虽然不乏夸张和虚构色彩,但是因为采用了不少符合实际的历史、地理资料,并且自然地渗入了街衢和人物风俗的描绘,所以呈现出鲜明的现实性和深厚的历史意蕴。如《东

京赋》写战国七雄修筑宫室“竞相高以奢丽”；至秦始皇则思专其侈：“乃构阿房，起甘泉，结云阁，冠南山。征税尽，人力殫”；汉高祖则因秦宫室，力行节俭：“摹逾溢，不度不臧。损之又损之，然尚过于周堂。”叙写历代宫室的修建，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再写洛阳宫殿、楼台的巍峨壮丽，气势宏伟；飞阁、游苑的富丽堂皇、绝妙幽深，也真实地反映了汉代都城和宫廷建筑艺术的发展；所绘市中商贾游侠、骑手辩士、角抵百戏、杂技幻术及商业的发达，物产的丰饶等，也是当时城市繁荣和汉帝国长治久安，物力富裕的真实体现。因此，京都赋的京都书写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依然有驰骋想象、铺张扬厉、夸张炫耀的成分，但是因为这些大体是基于历史、地理、制度、文明和风俗，所以并不虚浮荒诞，在给人以真切、现实感的同时，也呈现出作者深厚的政治忧患意识和鲜明的理性思辨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都市乃至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历史呈现。与此相类的，有宋、明时期众多的书院赋，以特定空间——书院的发展变迁、制度思想而反思文化、弘扬理学，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感和思辨性。

(三) 却市无哗，德人结庐

魏晋以后大量出现的宅居赋表现出对个体生存空间的关注。写作上，多以空间实体即室宇为表现对象，形式上以抒情小赋为主，内容上摒弃了楚辞空间叙写游仙和游猎赋、宫殿赋、京都赋夸耀、虚构巨丽之美的作法，而更多地叙写室宇，包括其环境、构件、命名及室主生活等方面以展示室宇所寄寓的精神意旨。如元代胡助《秋堂赋》描绘秋堂特点：“轮奂之美兮，不侈不陋；轩窗之旷兮，既固既周。”屋宇高大，不简陋也不奢侈；视域开阔，形制周正牢固，这显然也是作者的室宇审美理念。但赋之重点却是由室名“秋堂”来引发对人生志业的议论，提出“超乎荣辱”的人生态度。再由此推出秋堂之乐在于“左右书史，于焉藏修”，推崇“穷则秋归于一堂，达则秋行于天下”的儒者处世态度，肯定“秋堂”之名的深刻意旨。进而推论，在当今“邦国宾兴，斯文增重”，四方有事之时，当锐意进取，而不能专享秋堂之独乐。可见，相比汉大赋侧重于空间区域内的物质性夸耀，室宇赋更注重理性阐发。在审美上，私宅赋不以巨丽宏富为宗旨，而倾心于室宇个性、特色的彰显，在体物中加重了情感抒发和议论的成分。如王炎《林霏赋》写林霏居所的清幽净丽之美，这得

于自然，也缘于作者“去饰取素”的心志，是客观实景，也是主观营造：“倚萧滩之北湄，萃闾闾之万家。独德人之结庐，却市声而无哗。开楼观之净丽，纳江山之幽遐，疑老仙之一壶，藏物色之清佳。招鸥鹭与忘机，湛方塘之浅绿。卫以竹君之萧森，绚以莲娃之温淑。郁乔木其参天，输清阴而覆屋。抱虚白而不染，揽空翠而可餐。”极写室宇清丽幽远的环境，叙中有议，意在彰显其逍遥自得，燕处超然的林霏佳趣是摆脱了人世束缚的结果。相对于大赋的名物罗列，室宇赋多抒情小赋，往往重在叙写室宇环境和最能彰显个性、品质的室主生活及作为室宇标志的景观、器物或某个特点。如吴筠《岩栖赋》之栖于山岩；刘一止《三友斋赋》以麈、石、琴为友；杨万里《压波堂赋》筑屋湖上等等，相对于室宇空间、功用和整体布局等，这些本不过是室宇构建的众多因素中极为微小的部分，但却是赋中室宇景观的精粹，赋文从室主的钟情厚爱着笔，以“情”入境，以“德”入物，用比附、象征的手法，彰显室主的独异性情，也增添了室宇空间的意蕴美。

(四) 飞棹逸想，伏槛流思

游览赋多以游记形式出现，登临览胜——抒写怀抱是其大体的结构模式。其空间叙写往往宏阔幽远，多以瞻仰、追溯的视角审视其地理形貌、历史来源，作者亲临胜地，览观细察，描绘室宇楼阁、人文景观，写景状物大多细处着笔，力图逼真传神；注重对特定空间内人文史事的阐发，其评析议论，气势昂扬，识见高超，是作者思想学识、胸襟气质的充分展示。如汤显祖《豫章揽秀楼赋》写登楼远望，展现揽秀楼的修建和地理位置后，作者细绘其山川风物，用散文化的句式，白描化的手法，对渔歌唱晚、鹭鸣雁飞、樵舍炊烟、斟酒畅饮等系列景观逐一铺展，虽不及大赋之铺排渲染，富丽精工，富有气势，但把湖光水色之清雅恬静写得灵动生辉，别有风味。“则有逢掖深衣，园桥方履。颢颢、祈祈、雍雍、济济。或翱于庠，或吟于里。容服既则，周行有礼。尊悦皇风，瞻趋素齿。披文采友，来会于此。摘秀升之章句，析孝文之经史。镂道祖于图纬，绸次宗于元旨。若显若靓，或哦或倚。”描绘此地人文之美和游览者之情意形态，洋洋洒洒，意到笔成。作者不仅将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细腻感受融入对景观的描绘之中，营造出形象生动的场景氛围，而且“企飞棹而逸想，循伏槛以流思”还将自身塑造成画面中心，其把酒临风，遥

想贤士矢志,迁客多悲,思绪万端的形象,极大地增强了赋体的空间视觉感和情思意韵。

游观赋多写名胜,其地域内相关的人文胜景是引发作者思想的媒介,也是空间叙写的中心。通过相关场景的展示,触景生情,关联的或是历史朝政、社会时势,或是个体遭际,情感自然细腻,意蕴深厚。因为赋之“体物写志”特征,作者叙写名胜山关,自然就会突出这些最具特征且引发思虑的方面。如晁公溯《朝山堂赋》写蜀地雄视四方的地理形式,描绘群山之形态走势,“相属而赴望兮,高遮蔽乎日星。临以白帝之神秀兮,诚众山之所尊”,着意彰显“群山尊白帝”的地势特征,描绘室主于朝山堂“高四海以视营兮,时树羽江;屹三峡之镇其穹然兮,翼山四面而骏奔”的高阔视域,及“观万川犹知宗海”,“见群峰之起伏绵延兮,至是而亦必有所臣矣”的强大意念,其目的在于通过其独特的空间表征来昭示四方臣服、天下归一的政治意旨。

(五)五帝长驱,三皇遐武

边域赋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赋,其空间叙写更具纪实性和时势性特征,在写作上,愿想和祈请色彩更为明显。如班彪《北征赋》叙写北征行程,相比于楚辞,不仅摒弃了香草美人式的比喻和象征手法,而且减少了对客观环境的渲染,注重论说其相关的人文史事,呈现出更强的时政特征:“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回顾,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忿戎王之淫狡,秽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纷吾去此旧都兮,骖迟迟以历兹。”此段叙写行程,虽也有环境氛围的点染,但更多的是在特定地域空间内叙史事、叹时艰,情感抒发直接而显露。作者身处蛮荒野域,感时伤世,责问蒙恬,忧患民生,景慕文帝,祈请统治者宽仁绥远,立邦安民,凛然之气充溢寰宇。在场景展现上,地域性特征加强,取景也更为简易平实,宏观着笔,实景点染,情景紧密结合:“躋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森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鸚鸡鸣以啾啾。”荒谷山野,杳杳云雾、

皑皑积雪,群翔的大雁、鸣叫的鸚鸡等最具季节性和典型性的景物,呈现出边疆的特有氛围,也极大地强化了区域描写的真实可感。因为这类赋作家往往有赴边、临海的亲身经历,有的甚至就是真实行程的记录,因此,记录征程,描写荒远边境,抒发靖乱治国之思这是其常见模式。

边疆、海域因其独特的地理因素,常与民族关系相关,虽然赋中少有具体场景的描绘,但其经典的概括性画面却呈现出强烈的时事色彩和深厚的政治气息。如吴庆集《海运赋》:“羽归兮西路东渠,鳞集兮吴杭楚稻。云屯万屋,铜烧铁轴之船;雨萃千艘,珠岛银口之道。”港口船只汇集、粮食堆聚,这是通商口岸商业繁荣的盛况。胡薇元《海军赋》写海军检阅的宏壮场景,先聚焦皇帝盛大华丽的出场:龙舟驰骋,波浪滔天,空中战旗翻飞;再写阅兵的威武气势:兵旅遥相相对,部伍万千,车马枪炮,仪仗旗鼓,高烟声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写海疆阅兵,刻意强调其不同于仲冬大阅,有异于南苑阵行,并论说军备装置,表现出强烈的军事意识和加强中国武备、威慑海邦、维护边疆的强烈愿想。边域赋在空间叙写中,还多用展望笔法,写圣王之仁德、革新,因而呈现出一定的祈请、歌颂色彩。如赵九江《海运赋》:“庆泽国之安恬,靖海氛之沕鬱。风清舶舳,皴波影以潏洄;露积莲红,遍梗香而披拂。”写国家丰泽、四海清平的盛世局面;“我皇御宇,神存化过。兴国式廓,襟带山河。泽被寰海,长鲸息波。转输不竭,遵道无颇。……粒我蒸民,食德饮和。含哺鼓腹,后舞前歌。”想象海运通行,粮食转输畅通无阻,海疆平定,百姓安康的欢乐场景;黄逢元《铁路赋》展望铁路开通,皇国囊括四海,席卷八荒,雄图拓展的美好前景;这些对当时落后守旧的清朝政府而言,显然是作者祈请革新、展望未来的结果。

二 辞赋空间叙写的审美心理

《孟子·尽心上》云:“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①强调穷、达时不同的处世态度。对此,《荀子·儒效篇》也有论析:“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

^①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4页。

退编百姓而慤;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孰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①指出儒者应有的处世准则,无论穷达,都当坚守道义。隆礼义之大道,明社稷之大义,通晓裁万物、养百姓之纲纪,无论在朝在野,都为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为百姓尊崇、景仰。辞赋是中国古人历经世事和情感体验的艺术呈现,其铺陈描写所呈现的空间化特征,是中国古代知识群体在穷、达际遇下审美心理的表现。

(一) 颂美之情与仕进之志

在古代,赋、颂常连称或者互代,《汉志》云:“不歌而颂谓之赋。”李善注引《汉书》作“不歌而颂”,《文选》中,皇甫谧《三都赋序》亦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又《说文》:“颂者,容也。”故赋之铺陈描写,于物之穷形极貌,为“容”,也即“颂”。在封建王朝的强盛局面下,帝国之声威和气势,使身怀兼济志的文人更容易受时代感召而产生豪迈情怀,表现出对皇权的景仰。汉大赋叙写皇宫、猎苑、都市等,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贯通古今的宏大视角,审美上对“巨丽”的崇尚,作品中昂扬的格调,蓬勃进取的精神,都与其密切相关。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云:“赋家极轨,要当盛汉之隆。”在武、宣之世,宫廷赋、游猎赋的兴盛,正是因为大赋的夸张、宏丽,能彰显帝国声威和气势,符合当时时势,迎合了统治者的喜好。《上林赋》酣畅淋漓地夸饰上林苑的物产富丽和奇景胜状,突显空手击杀野兽的勇士、恣意驱驰的车队、锋利强劲的武器等,显示楚王游猎之宏壮,这还只在物质形式上压制齐、楚。《孟子·尽心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充实阔大而又有光辉才能谓之“大”,大且能感化万物才能称之为“圣”,无论是“大”,还是“圣”,都强调对德的彰显。因此,无是公面对邦国使者子虚、乌有的吹嘘夸耀,极力推崇天子之苑囿,以齐、楚之地比照天子之苑,以此展现皇权至高无上和天下一统思想。不仅这样,清人何焯在《古文辞类纂评注》中说:“此赋以四大段立格:双撇齐楚,提出上林,是起;次序上林之地,是承;中言校猎之事,是转;

末言天子之悔过以示讽谏,是结。文之局极开,文之法极细。意在讽谏,而先若盛称其美者;政(正)欲于热闹场中,下一转语,使之回心易虑,此所以为讽耳。”认为其行文布局意在讽谏。赋中亡是公夸耀上林苑也先立足于道德的高度,批评子虚、乌有之言:“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这与汉初“过秦”思想一致,认为齐楚之游乐,奢侈荒淫,与秦之“仁义不施”没有两样,而天子上林苑之游猎,则是大国风范和武功实力的展现。在赋之末尾,作者更是笔锋顿转,用天子悔过来说理陈志:“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认为天子游猎虽在治政之余,于国无害,但过于奢侈,如果后世仿效不知节制必然会影响到国家千秋大业。天子思过、施仁之举,这是作者对“暴政亡秦”的反思,也是讽谏皇帝要恤民、爱民。至于施惠爱民的具体措施:辟林苑为农郊,毁宫馆,发仓廩,救贫穷,补不足,以及“恤鰥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等,这些都是儒家仁政思想的生动展示。而倡节俭、施仁义,这种针对现实政治的“美刺”精神,正是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积极仕进、兼济天下精神的体现。同样,京都赋对城市繁华、人生世态的关注;扬雄《羽猎赋》沿用《子虚赋》《上林赋》天子自我反省模式,其《长杨赋》消减了对游猎场景的铺叙,叙说先帝创业之艰和仁义守德,这些都源于政治意念对文学的渗透。也正是作者政治情怀的渗入,京都赋、宫殿赋之空间叙写更偏重于制度文明而带有明显的宣教意味。如《东都赋》中东都主人论析高祖建都长安,兴建宫殿,是因为“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是形势所需,而非出于奢侈享乐的欲念。这就直接鲜明地道出了作者说教的目的。又将西都与东都加以比较,称赞东都洛阳有地理形势之利与礼俗淳厚之优,宫殿建筑、设置合乎王道,铺叙、宣扬东都“图书之渊”“道德之富”,以此彰显其“统和天人”“同履法度”,以东都之礼乐、仁德,折服西都宾,表明当设东都的创作主旨。这些足可见《两都赋》之创作是源于政治上定都的争论,班固所要表现的是自己的政治思

^①董治安,郑杰文:《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22页。

想与迁都主张。因此更多地从历朝往代之事来加以实证,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的重要,而不像《子虚》《上林》用虚夸的罗列铺排,以气争胜。总之,游猎、京都、宫殿赋的空间叙写呈现出对皇权的颂美及对政治的关怀,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士的仕进之心和兼济之志。

中国古代文士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但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仕途常常受挫,理想与现实呈现出异常尖锐的矛盾。意欲变法图强、存君兴国的屈原,在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的楚国遭受诽谤、流放,其自传性作品《离骚》所表达的迫阨压抑与执着追求,就是内心愿望与外在环境强烈冲突的体现。执着于王道美政,上下求索,神界的高远、玄乎,都可看作其政治经历和内心痛苦历险的生动呈现,而由此产生失望悲愤的情感,则是楚辞和后世“士不遇”主题赋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对空间的叙写,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但其实质都是对现实的失望及“不遇”的痛苦。如《涉江》榛莽丛生的地理空间、人烟稀少的景观气象,既是对流放环境的形容夸张,也是对当时险恶政治环境的隐喻。《湘夫人》叙写相会场所:“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于水中建堂,并用众多的奇花、异草、香木加以构造修饰,室内配备富丽珍奇,用想象和浪漫的描绘,极力展现相会环境的华美,但梦中相会的场景越是流光溢彩,就越能彰显出人物内心对相会的渴盼,和此刻未能相见的焦灼。这是以想象空间的美好来反衬人物现实处境的失落。较独特的是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大人”浮游仙乡天国,虽然也是因为现实的迫阨,但其述游求仙却一改悲荒叹远的格调,而用夸艳之笔极写遨游盛况,轻举飞升中渗透着仙道的轻盈、顺意;虽然经火山、渡弱水,穿沙丘、过荒漠,但“大人”游水嬉戏,有女娲弹琴,冯夷跳舞,天神诛风杀雨,最后径入天宫,载上天女。远游之途自由快意、欢快祥和。但本文之奇伟在于,作者展示仙界中西王母之容仪:“矐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鸟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可知作者对神仙世界并没有多大的热情。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如是说:“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意即通过仙人的居所、生活、神态,表达了仙界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居所。故龚克昌说:“《大人赋》好像是为了满足汉武帝的好仙欲,其实那是说反话,……实则在对武帝进行了委婉的讥刺。”^①因此,无论是对仙界的委婉讥刺,还是对黑暗现实的轻举远扬,都是对现实政治处境的不满和无可奈何的反抗与执着追求。

(二) 善其身与游于艺的优雅之态

中国古代文人在现实遭遇困境和挫折时,常常会回避矛盾而选择退居,这是魏晋后私宅赋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宅居赋更多地关注个体,大多以室主生存为视角,在清幽静雅的环境中,刻意展现室宇有别于都市繁华的避远和天然之趣、静处之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古代文士在现实困境中的一种自我调剂和心灵抚慰。苏轼因反对新法,不容于朝,被迫外调,谨慎稳重的苏辙以“超然”命台,作《超然台赋》,写超然台巍峨壮观,凌空而起,“曾陟降之几何兮,弃溷浊乎人间”“极千里于一瞬兮,寄无尽于云烟”“嗟人生之漂摇兮,寄流枿于海壖”,登临高台,渺极云烟,感叹人世沉浮,劝告其兄宦海沉浮,终年紧张劳累,不若超越自我和人世纷争,超然物外而无往不胜。这是古代士人在政治失意后常有的心态。儒家主张修身养性,《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②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以修身为本。“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高尚境界,但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外在的客观条件。《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③在天下无道,德不能彰,仁不可依之时,还可“游于艺”,即超出事功之心,以优雅的姿态醉心文化,探究学问。因此,即便遭遇挫折,仕途失败而退居乡野,依然可以坚持道义。故刘三吾《野庄赋》室主贵为王侯,却居于田舍,巾幅杖藜,依岩阅畊,临流赋诗,“问起居兮母所,具甘旨兮上堂;愿友于兮勿替,使母心兮乐康。则是庄之居,又以友乎兄弟,而不可忘抑。”描绘乡野的居

①龚克昌:《司马相如论》,《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②《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9页。

③《论语》,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7页。

家场景,字里行间表露出对儒雅的赞赏。作者还特别强调室主诸兄弟并非“直求田问舍而已”。“当河汾之授徒,纷衿佩之云集。闻岁奉之清俸,犹赋役之所入。顾此田之所收,岂野庄之能敌。自征登于仕涂,已笔耒之久歇。幸心田之克治,无草茅之交塞。种之以经训之蓄,奋溉之以伊洛之道。脉耘之以克己之工夫,敛之以道德之充实。”强调这里也是王侯畊之以舌的“墨庄”,突出野庄作为馆舍的教育功能和自己传承理学的骄傲。这也是道义坚守的一种,故身处田园也能优雅从容。元代王祜《咏归亭赋》写其身处清幽静谧的田园:“既琴瑟之在前兮,亦左图而右书。”琴瑟经籍相伴,亭名“咏归”,表明自己超脱名利,返初求道的决心,显示出室主的儒者情怀和学养。谢应芳《闲居赋》写自己灌木为宇:“朝吾游于道圃兮,夕吾憩于艺圃。思衡门之栖迟兮,慕考盘之穷处。”远离俗世喧嚣,图书经史,高雅闲逸。这些都是古代士人善其身而游于艺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圣贤”的标准要求士人,士人也自然以“圣贤”自任,但“在张扬自我,极力表现自己接近于‘圣贤’的能力与人格的背后,是其无法真正独立的尴尬地位”^①。这正是宅居赋空间书写趋向个体与内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道义心与强国利民之情

修身齐家治平,体现了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②这是中国古代知识群体发乎内心的使命感和社会道义心,与之相伴的是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③在中国古代不乏有士人张扬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也不乏志士勇担社会责任和文化道义,特别是在关系民族危亡、百姓安康之时,他们更是为之奔走、呼吁。如晁公溯《朝山堂赋》叙写朝山堂“群山尊白帝”的独特空间表征,并以其空间障碍作喻:“吾直欲铲赤甲、白盐之叠嶂兮,洗苍藤翠木之幽昏。”表达要铲除险隘,维护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这显然是对当时偏安江南,积贫积弱,面对强大外敌,南宋王朝的政治权贵却依旧歌舞升

平的现实所表现出的强烈愤慨。韩元吉《万象亭赋》写公卿巨室、佛道宫观虽然鸣钟相闻,择胜而居,飞栏危榭,但远不及万象亭宏大壮伟;用沿海城镇之和美宁静、百姓聚观拜伏的场景,突显叶梦得任职后治盗除害的盛功伟绩。蒲宗孟《隶业堂赋》肯定孔明“志在康济兮,泽此黎蒸”,天下为重的品行,感叹时世乱离,隶业堂芜没于荒草乱石的败落场景,提出“重敞兹堂”的希冀,表现出反思社会思潮的良苦用心。还有众多名人庙宇赋借神灵以彰显淑世之志。如苏辙《屈原庙赋》写凭吊屈原时神灵纷沓的场面,以屈原的口吻写进退无依的痛苦:“抱关击柝兮,予岂责以必死?宗国隕而不救兮,夫子舍是安去?予将质以重华兮,蹇将语而出涕。予岂如彼妇兮,夫不仁而出诉!惨默默予何言兮,使重华之自为处。予惟乐夫揖让兮,坦平夷而无忧。”正是苏辙所处之时世、境遇形成的特定语境^④,并借助系列语气词,促成了屈原的愤慨之情附着转化为作者处身乱世的幽思。同样的题材,清代朱国鑾《纪玉庙赋》所抒发的情感就更直接:“今过瓦砾之荒场,慨兵燹之余烬。每念天灾未复,孰与欢娱;重伤世事如斯,不堪问讯。”在庙宇的荒凉景况中感叹兵燹祸乱,叙写纪信镇的历史,再绘现在之荒败,庙宇亏缺破旧,百姓重建却缺识少财,镇上“官兵如织”,“肉进大官之膳,贵不可言”,为官者为威作福,“兵驰操练,农乏种耕”,民不聊生,作者直笔祸乱频起的末世景象,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政府官军,“与其河上劳师”,“不若地方起役”,表现出直斥时事的勇毅与义愤。中国古代文士修齐治平的人生志趣和心怀天下的仁爱精神,必然决定了他们在特定空间内的对天下、民生的关注。故苏辙《黄楼赋》中,苏轼于黄楼上,目之所触是徐州孤城被汪洋大水环绕的灾患景象;心之所想则是汉元光年黄河决堤以至“民为鱼鳖,郡县无所”的灾害历史。故水退民安时,作者虽然同样是用全景视角和赋体惯用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铺陈的方法,极写徐州天宇宏大,青山绕城,彰显其形势和地理位置,但作者叙写各方形势时各有侧重:写东望重在其“连山参差,与水背驰”的地势,突出其“城堞为危”的

①张英:《“不在场的情人”:论唐宋词中的“时空阻隔”》,《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②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9页。

③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8页。

④张渊,吴福祥:《谈语气词“着呢”的来源及演变》,《古汉语研究》2021年第2期。

景观;南望则重在戏马台、巨佛峰的岿乎特起之势,强调其高耸云端,下望徐州,可见楼阁巍峨壮丽;西望重在田园庄稼,展示其麦熟乔秀,白鸟飞鸿的欢欣景象;北望重在河、泗交汇,突显其商旅船只络绎不绝的热闹。从这些刻意突出的重点,可知作者旨在彰显徐州为兵家要地,关系国家安危;物产丰富,关系民生。但朝廷并没把徐州纳入重点救济的范围。由此可知,作者对其全方位的叙写不仅是基于现实景观,而且更有“微言大义”的良苦用心。作者联想、对照往昔项籍等追功立业,闵河水,吊古人的感伤,表现出心忧天下的博大胸怀。身处特殊时势,又遭遇特定空间内的特别物事,睹物兴情,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就最容易被激发。故郝经出使南宋,途中应邀赴宴冠军楼,登高望远而作《冠军楼赋》。冠军楼四周的边疆险阻,其命名,南宋偏安的政治局势等,都在冠军楼这一特定的时空激发读者,慨叹今昔,认为蒙古国有长城、淮河之险,藩墙不决,故当威惠并举,才能使奸宄遁迹不起,强调德治的必要,体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明初理学无生气,书院不振,到了王守仁、湛若水到处讲理学,书院也随之大为发展。”^①孟思《东山书院赋》:“崇堂辟宇,非为游乐,所以理性也。朋来敏学,非以徒

群,所以为政也。”强调书院创设的学术和政治目的。明代书院赋随之兴盛,将书院的兴盛、衰落与圣道传承、人心道德相联系,体现出浓厚的忧道济世情怀。晚清因为列强侵犯的政治现实,基于清政府之懦弱无能,及迫切增强军威、国力的需要,胡薇元《海军赋》论说军备装置,引入周王观兵、周亚夫屯兵细营等极富意蕴的历史典故,体现出在晚清时期,在遭遇列强虎视的情况下,作者创设海军,加强中国武备、威慑海邦、维护边疆的强烈愿想。边域赋以展望的笔法,写圣王之仁德、革新,畅想圣皇仁德泽被四方的繁盛场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晚清士人在中国落后的局面下,激励国人,实施“变通”,实现富国强兵的美丽愿想。

结语

中国古代的赋体文学,因为其“体物”特征和铺陈方法,呈现出鲜明的视觉空间性。中国古代文士的道义精神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方式,使他们在不同时世和人生际遇下,观感物态,思考时势,体察人生,以强烈的意念化解自身与外在矛盾。在赋文中,呈现出轻举远游、包举万物、却市独居、览胜抒情、长驱遐武等不同的空间结构方式。

On the Spatial Writing and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in Ancient *Fu*

YI Yong-jiao

(Research Center of Cifu and Parallel Pros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ancient *Fu* is influenced by space in writing purposes, presentation forms and aesthetic preferences. Carrying on Chinese people's traditional mode of thinking that emphasizes personal feelings in understanding the outside world, and space description style that is based on specific objects, the spatial writing in *Fu* is full of consciousness tendencie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to different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like pursuing ide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extolling imperial power, advocating living alone and withdrawing from worldly affairs, taking advantage of majestic scenery to express emotions, and concerning oneself with the borders. Through them, the emotional changes of authors as they experience life ups and downs are vividly presented, and the life values, and morality and spirits of intellectuals in ancient China are reflected.

Key words: *Fu*; spatialwriting; culture; aesthetic preferences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